

汉语基督教文化理论系列

策划 汉语基督文化研究所

主编 刘小枫

杨廷筠——

明末天主教儒者

[比利时]钟鸣旦 著
圣神研究中心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比]钟鸣旦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

(汉语基督教文化理论系列)

ISBN 7 - 80149 - 822 - 4

. 杨... . 钟... . 杨廷筠(1557~1627)——生平事迹 . B97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205 号

·汉语基督教文化理论系列·

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



著 者: [比] 钟鸣旦

责任编辑: 柯 舟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822 - 4 B·125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版序言

中国向来有对外国思想与经验虚怀开放的人。甚至不妨说，这种开放性还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例如，在战国时期，学者往往不能见容于本国，只能流离他乡。要是当年孔丘和孟轲在列国未受款待，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思想还能否流传至今。后来，中国人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都曾接受了佛教，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向亚洲其他国家传播的“出口产品”。

面对远方传来的新思想时，有人会惯于强调自己传统与新思想间的差异，也有人会喜欢突显两者间的相似。例如，宋代学者陆九渊（1139～1193）就有名言，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400年后，到了明末，东西方学者相遇时，陆九渊的这句话，最为人称引。这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传教士间的交往，有人称做东西文化交流中最富生机者之一。

在这历史性的交往中，有关西方的出场者，像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 1666) 或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 发表的论文专著为数已经不少, 本书所勾画的, 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场者之一杨廷筠 (1562 ~ 1627) 的生平与思想。杨廷筠与另外 3 位著名的出场者是同代人, 这 3 位是徐光启 (1562 ~ 1633)、李之藻 (1565 ~ 1630) 和王征 (1571 ~ 1644)。初看起来, 杨廷筠的一生, 并无过人之处。他只是平常的一介入宦士人 (scholar - official), 通过廷试而登仕途, 起初为安福知县, 后任监察御史和顺天府少京兆。杨廷筠熟悉宋明理学, 写有几本这方面的论著, 而且一度活跃在故乡杭州的佛教居士运动中。然而, 杨廷筠在人生的某一时刻, 接触了西方传教士, 他们的讲论, 令他倾倒, 于是请求领洗成为基督徒。杨廷筠成了大发热心的皈依者, 在朝廷禁教期间, 庇护耶稣会神父不受伤害, 还写了一些阐述基督宗教思想的文章。

杨廷筠为何年届知天命还要成为基督徒? 像他这样一个饱读中国诗书、传统学养深厚的人, 又如何诠释西方基督宗教思想? 这类问题构成本书研究的起点。但是, 杨廷筠的思想, 无法截然抽离他的生活及所处的时代脉络。应当解答的相关问题包括: 杨廷筠多大程度上适应当时的仕宦模式? 他又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和宗教运动? 他是如何充当理学学者的?

因此, 杨廷筠研究就不只是中国晚明学者生涯的研究, 也不能单单归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这种研究要设法弄清楚: 甲文化的思想是如何被乙文化的成员接受、改造或拒斥的? 简言之, 这种研究关注的, 是不同文化本身间的互动现象。杨廷筠的著作对这个问题无疑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研究。

本书新版的编者，要我谈谈自己是从何处得到杨廷筠研究的原始材料的，因为有许多中国学者提出了这一问题。我首先得指出，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也应当从中国人的角度加以叙述，所以使用尽可能多的中文文献，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至于文献来源本身，则出自我1982~1983年在沪京两地居住时曾大加利用、蕴藏丰富的中文图书馆。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我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披阅《明实录》，抄录了绝大部分的资料，——因为那时影印收费太昂贵，而且常常还不让影印，——我有时得等上两个多月，才蒙允许观看某些书卷，而另一些书卷则从未寓目。不少中国学者尝试做研究时特有的沮丧，我常常感同身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经历让我越加敬佩杨廷筠，大家在本书会读到，当安福知县时杨廷筠有一部十分古老的文献，但他没有秘而宝之，而是公之于众以利天下。

我18年前完成此书的写作，第一个中文译本的问世，至今也有15年了（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87）。除了可以增补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有关杨廷筠的史料，我基本上没有改动这本著作的内容，虽说我个人的解释有了些许变化。可喜的是，有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杨廷筠及其他明末的基督徒学者感兴趣。例如，杭州大学有几位学者已经研究杨廷筠，有些人还称杨廷筠为“第一位中国神学家”。美国有一批华人学者正在将杨廷筠的著作译成英文。总之，窃愿本书新版仍能促进对中国基督宗教这一早期历史阶段以及当时中国与欧洲间交往史实的研究。

最后，我乐意向促成这一中文修订版问世的诸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于比利时鲁汶大学 (K . U . Leuven)

目 录

新版序言 1

第一编 杨廷筠生平

导 言 3

第一章 官方资料 6

第二章 民间资料 28

第三章 中文宗教传记资料 65

第四章 西方资料 93

第五章 杨廷筠传记资料的处理 126

目
录

第二编 杨廷筠思想

引 语	139
第一章 杨廷筠思想	141
第二章 佛教对杨廷筠的批评	204
第三章 耶稣会士对杨廷筠的评价	228
结论 东海圣人与西海圣人	262
参考书目	284

第一编

杨廷筠生平

导 言

如果我们以传记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是否重要的话，那么，很容易得出杨廷筠并不重要的结论。田继综主编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学引得丛刊第24号，三册，北京，1935）里仅提到他一次。即使在汇集1368~1612年4000多名监察官员小传的《兰台法鉴录》中，对于杨廷筠，也只是简要记述道：“杨廷筠，字仲坚，浙江仁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三十年（1602）由江西安福县知县选湖广道御史，三十二年（1604）巡漕，三十三年（1605）巡按苏松，三十五年（1607）督学南畿。”在另一种重要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1965~1966年出版，1978年重印）中，竟对他只字未提。20世纪其他出版物，如《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81，江苏出版），也没有关于他的材料。

然而，当我们研究明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时，就会特别对杨廷筠予以注意。杨廷筠传记出现在西方A·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1）》（1943，华盛顿出版）中。严格地说，他不应包括在这一时代，因为他死后

15年，清代才开始，但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一些晚明人士和基督教徒也列于其中。同样，在L. C. 富路特的《明代名人传》（1976，纽约、伦敦出版）中，有杨廷筠的一些资料；在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1981，上海出版）里也有他的一个小传。

事实上，关于杨廷筠有着更多的资料，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官方资料，如史部官修正史《明史》、《明实录》，以及私人著述或半官方近乎正史的《国榷》、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汇集和科举名录等。

第二类是属于集部的大量有关杨廷筠生平、家庭和生活背景的材料，见于亲友的书信、诗文、赞词、墓志铭、日记等等。

第三类是有关杨廷筠宗教生活的描述，主要有中文的《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还有一些补充材料是宗教界朋友或批评者对他的宗教行为所作的评论。

第四类是西方资料，西方传教士在关于中国教会史的报告中所描述的杨廷筠生平，这些一年一度的以书简形式的年度报告，是又一种重要资料来源。

综合运用上述资料，使得撰写一部杨廷筠传，成为可能。例如年谱，杨振鹗已经按其生平经历的年代顺序编成《杨淇园先生年谱》（1944，重庆初版，1946，上海再版）。在《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1）》中撰写杨廷筠传的王重民（1903～1975），曾就《杨淇园先生年谱》于1946年6月和1947年12月写过两篇书评，其中有很多新材料。以上著述构成本书资料的基本来源。笔者爬梳查阅了全部

有关资料，运用原始文献（特别是杨振鹗很少利用的地方志），发掘了有关杨廷筠生平的新资料，而且努力把资料置于明代晚期政治、社会、文化和哲学的背景之中。然而，我有意地不把四种资料综合在一起写成一部传记，而是分别加以叙述。虽然笔者深知这样做会有所欠缺（例如，可能导致基本资料的重复），但是，希望这样可以突出显示中文和西方资料编纂的本来面貌，换言之，希望借此方式揭示出杨廷筠生平隐晦不彰的部分。

导言 附注：

《兰台法鉴录》卷 20，页 53，7~9。

HUMMEL，页 ~ 。

《宗教词典》，页 493。

参阅王重民（1946），页 6 及（1947），页 25~34。有关杨氏之生平，可见 ELIA 所著的《FONTI RICCIANE》卷 3，页 13，3；方豪（页 125~138）的个人研究，对杨氏生平只提供了片面的资料，不甚完整。方氏并未曾提及王重民及杨振鹗的著作，只提到了他自己的文章《近十年新发现之教会先哲遗文及史料要目》。此文载于《上智编译馆馆刊》，6（1947），页 489~490。他以笔名“绝尘”发表此文。在该文第 489 页及第 490 页，可找到有关李之藻及杨廷筠的资料。虽然方氏对有关杨氏的介绍，大部分根据王重民的资料，但他却未曾明显提及王氏之名。

方豪亦曾著有短文，名为《李我存杨淇园先生传略》，见《我存杂志》，2（1937）页 1。

本书将尽量应用第一手资料。对于王重民及杨振鹗二人的著作，本书虽未曾大量采用，但并不因此否定其贡献。

第一章 官方资料

要重视杨廷筠的身世并不容易，因为从官修传记中，我们既找不到准确的出生日期，也看不到对他童年的任何记载。家庭资料也相当缺乏，只知道他的父亲杨兆坊，似乎从未作过官；他的祖父杨周于 1541 年中进士，曾短期任过工部主事。他的堂弟杨廷槐，是其叔杨兆金的儿子，于 1595 年中进士，也曾当过官。

杨廷筠，字仲坚，别号淇园，浙江杭州仁和县人。杭州位于长江中下游，与苏州、常州、松江、嘉兴以及南京等名城齐名，处于晚明文化与学术中心地域。杨廷筠于 1579 年中举，13 年后，即 1592 年，通过廷试获三甲第 36 名。

以上记述是由地方史志资料补充而成。而采用的另一罕见史料是记录 1592 年廷试考生官阶的抄本《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1646 年编就）。此记录首先按考场顺序排列考生名单，杨廷筠和其他 22 名考生分在春秋房；其次列出考生出生日期，据此有特殊价值且为仅有的资料，可以断定杨廷筠的生日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¹，即西历 1562 年 6 月 25 日。记录中还录有他父亲、

祖父的名字，甚至他曾祖父的名字：杨俊²。而特别是记录了杨廷筠一生达到的最高官阶是顺天府丞。

根据官方资料可以把杨廷筠的仕途分为三个阶段：（一）地方官（1592～1599），（二）监察御史（1602～1609），（三）其他职位（1622～1625）。

第一阶段：地方官（1592～1599）

廷试后不久³，杨廷筠被任命为江西省吉安府安福县知县⁴，在任约7年⁵，算是相当长的。

在《安福县志》里，零散地记载了杨廷筠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任职期间，他重建了安福县公署⁶，并于1597年建立了安积仓⁷，还减了赋税⁸。县志中对他的政绩给予了肯定评价：

杨廷筠……平易近人，不设畛域，缓催科，均徭役，赋民不苦之尤。加意学校，月有课，岁有试，引接后进，勤勤不倦。入覲以士民请得复任。曾旱虐不雨，公闻之，恻然驱车遄至，雨亦随降，父老欢呼曰“此仁侯雨也”。逊弗居，不以雨闻而以旱闻，得请改折。民赖以苏，诸惠政详便民纪略。⁹

还应特别提到安福的学术风气。安福是王阳明江右王门学派的中心。黄宗羲（1610～1695）《明儒学案》中曾集中列举超过三分之一的思想家来自安福，还有一些是来自附近的泰和、庐陵和吉水等地⁰。黄宗羲认为，这一宗派

是直接承继其祖师王阳明（1483 ~ 1541）王学的：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是时越中流弊错出¹，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²

邹守益（别号东廓）发扬光大王阳明的思想，是江右王门学派中首屈一指的哲学家：

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先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³

杨廷筠在安福知县任上时，刘元卿（1544 ~ 1609）⁴和王时槐（1522 ~ 1605）⁵，这两位当时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都已辞官归乡，在安福讲学以度晚年。

像很多地方一样，安福的学术生活也集中在半私立的书院，这些书院大多是由宋代理学家所创立，到晚明再度复兴（特别是在嘉靖 1522 ~ 1566 和万历 1573 ~ 1619 年间）。这得力于王阳明及他同时代的湛若水（1466 ~ 1560）的提倡。湛若水曾是陈献章（1428 ~ 1500）的学生。他们倡导议论讲学，这种讲学方式后来在全国各地建立书院时，为广大追随者所沿用⁶。

江西省是在创立、复兴和重建书院方面最活跃的省

份²，这可由安福的书院数量来说明。安福县建有二十多所书院，下面是 16 世纪末最负盛名的 5 所：

复古书院	1536 年创立；1562、1584 及 1603 年复校。
复真书院	1558 年创立。
复礼书院	1572 年创立。
识仁书院	1591 年创立。
道东书院	1593 年创立；1604 年复校 ⁸ 。

复古书院最初是邹守益为纪念他的祖师王阳明而创建的。后来这个书院也同为纪念其他理学家，包括邹守益。王时槐和刘元卿与复古书院的关系都很密切⁹。而且，王时槐和复真书院以及道东书院，刘元卿和复礼书院以及识仁书院⁹也有关联。

以复礼书院，即“恢复儒家伦理的书院”为例，一所书院可具有四种不同功能，每种功能的重要性，则视各书院而异。下列资料源自刘元卿于复礼书院创建时所写的《复礼书院记》³。

顾名思义，复礼书院以发扬和实行儒家传统道德为宗旨。处于明代当时重权势和金钱而轻伦理道德的氛围中，书院引导人们复礼，恢复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并且强调孝友、好义，提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普遍实现人伦之道。

刘元卿认为以上这些封建伦理关系，通过讲学肯定能够实现。他强调用儒家典型的方法“学不讲则不明”³，与

人交换观点。于是书院成为学习和讨论的地方，事实上，这就是明代 16 世纪初以来创立的大多数书院的首要功能。它们是哲学家们阐明学说的思想中心，而且是培育学生走入仕途的教育中心。无怪乎朝廷在 1537、1538、1579 及 1625 年曾几度颁布私立书院的禁令，原因是惧怕政治动乱与王阳明学派有关。但禁令的作用不必夸大，许多书院都平安无事，那些即使当时被毁的，不久也重建起来，而且还兴建了一些新的书院³。

书院的另一种功能是纪念和祭祀。一般来说，学问德行出众的人会被作为群体的榜样供奉在专门的厅堂里，例如，复礼书院的学生们在明德堂祭祀王阳明、邹守益、刘阳（1525 年中举人）和耿定向（1524 ~ 1596）。后来，又增加了刘元卿³。在安福县的其他书院崇祀的名流，大多是在安福县地区内去世不久的⁵。

最后，书院也是当时社会交际的场所，这恰恰体现出加强社会联系的重要作用，用刘元卿的话说：“讲学以会友明伦而已。”⁶

当时杨廷筠的学术圈子主要在安福。他曾写过一首诗记述与刘元卿、刘喜闻同游书林洞的事³，这证实他与刘元卿相识。而他和书院的关系也是有迹可寻的，杨廷筠曾记述道东书院于 1593 年创立之事，可惜这篇记叙文没有保留下来⁸。

有趣的是，在复礼书院后面有一间收藏书帖的“杨侯留帖阁”。对此，邹元标（1551 ~ 1624）曾有专文记述⁹，其中提到这一非常古老的书帖，经历几代人最后传到杨廷筠手中，杨廷筠精心地保存它，曾说：“此安成（即安福）重宝也，吾当为安成存之而已。”⁹邹元标根据书帖上的注